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宋代文学研究论稿

任竞泽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

任竞泽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任竞泽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ISBN 978-7-100-07189-5

I. ①宋… II. ①任… III. ①文体论—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471 号

国家“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基金资助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
任竞泽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189-5

2011年11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2 1/4

定价:32.00 元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编 委 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编：张新科 李西建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歌东	尤西林	冯文楼	邢向东
李继凯	刘生良	刘锋焘	李 强
吴言生	张学忠	杨恩成	赵望秦
赵学勇	胡安顺	党怀兴	高一农
高益荣	曾志华	程世和	傅功振
傅绍良	霍有明	魏耕原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工作委员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任：李西建 张新科

委 员：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代”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相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其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于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借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 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 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 古今文学演变。以长

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领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 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 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

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 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喜爱,已经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 “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 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

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于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

VI 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

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的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序

任竞泽博士的《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书稿杀青之后,向我索序,我欣然应允,乐于向学界同行们介绍一下竞泽的这部著作,以及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竞泽是我带过的文艺学专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于2005年至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张新科教授作项目研究,出站后便留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研室任教,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文论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竞泽在硕士阶段学的是宋代文学专业,记得在他来北京报到入学之后,我和他有过一次长谈,主要是藉以了解他的专业知识背景以及研究兴趣所在。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竞泽在唐宋断代文学史和古典文献学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亦有颇为敏锐的理论批评意识,而这正是研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所需要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学习背景和知识结构。在交谈的过程中,我还得知,竞泽对于唐宋集部有较大的兴趣,尤其是对其中的总集、选集类典籍,更是下过一番功夫。除此之外,竞泽对于唐宋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辨体批评,也有着较足的

研究劲头,颇有独到见解的研读心得。这亦是从理论批评的层面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所需之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便商定,他在博士生研习期间,以及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在宋代文体批评现象和文体学思想这一范围,力争使将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成为一部宋代文体批评和文体学思想观念方面的专著,并且在学术上有所推进,有所创新。

竞泽在攻读博士学位的3年学习期间里,就是始终瞄准着这一学术目标而展开自己的研读和思考的。现在即将要出版的这部《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就是他博士毕业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之后,又以数载的功夫,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修订而成的。所以,这部专著从酝酿、选题策划,到收集、分析文献资料和构思框架提纲,再到具体的撰写、修改、扩充,以及书稿杀青前的最后校订,全部过程持续了将近7年之久。对于竞泽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道途上充满了荆棘、峭壁的学术攀登,攀越过程之艰险与辛劳自不待言,确切地说是对他的信心、耐力的一大考验。但是,唯其如此,方能于险绝处发现风光,于曲折处发现峰回路转。同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一磨炼,竞泽的学术自信心得以树立,学术理念和方法初步得以确认,以及研究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得自己在学术研究领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正是我所感到欣慰之处。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逐渐兴盛起来,成为一个颇具前沿性的热门课题,成果斐然,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断代文体学研究,也是其中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层面。关于断代文体学研究,研究的热点主

要集中在汉魏六朝及明代这两个文体“总集大成”历史时段,而对于宋代文体学的研究,相对而言,则关注的不足,现象层面的描述和理论层面的阐释均不够全面、深入。而在中国传统文体演化的过程之中,宋代的文体现象、文体批评、文体思想观念演变,实际上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宋代,文体形态、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等都有丰富的现象呈现,所流传下来的这些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源,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宋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很大,也亟须深入开掘。竞泽的宋代文体学研究,就是本着这一认识而展开的,他试图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文献、文体形态个案等不同视角出发,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进行研究,力图通过有限的研究来透视出宋代文体学的全貌和总体特征。应该说,他的这一研究路径的选择,贯彻了当初我们一起讨论时所认同的意旨:从现象入手,坚持个案、专题性研究,不做单纯的面面俱到的介绍和描述,避免写成仅仅可用为讲义的概论或通论式著作。

愚意以为,竞泽的这部著作,在关于宋代辨体批评、总集和类书编纂与文体分类、文体个案研究这三个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值得肯定和关注。首先,宋代虽然没有出现像《文心雕龙》那样系统的文体理论著作,但诸如王安石、黄庭坚、张戒、倪思等“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批评言论,以及诗文之辨、诗词之辨等文学论争,实际上推进和充实了中国古代的辨体批评理论,而严羽《沧浪诗话》中之辨体批评,则更见系统,并且贯穿、应用于他的整个诗学理论批评的话语系统之中,应该说是宋人辨体理念的集大成者。宋人辨体批评理论既是宋人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论争的反

映,反过来也成为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论争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宋人的辨体批评还体现在总集编纂的辨体意识上。对此,竞泽在该书上编之中,分别通过严羽《沧浪诗话》之辨体批评、王应麟《辞学指南》和《玉海·艺文》的辨体批评思想、总集和类书编纂所体现的辨体意识等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诸多发现。其次,我们知道,总集、类书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而以《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四大总集为代表的宋人的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诗文选本的发展史上又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而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在分类方法上便从分类和归类两方面齐头并进。在宋代,《文苑英华》、《唐文粹》和《宋文鉴》继承了《文选》文体分类渐趋繁复琐细的传统,而《文章正宗》则以其“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分法之化繁为简的文体归类在中国文体分类史上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唐宋文体批评的理论贡献,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方面也有重要的体现。唐宋类书和总集一样,不但在文体分类和指导写作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文体学价值,而且《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事文类聚》、《玉海》等最重要的几部唐宋类书中的“文部”,其纂述体例基本符合刘勰《文心雕龙》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研究思路。《艺文类聚》和《古今事文类聚》“文部”体例中“序题加选文”的编纂方式则上承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和下启明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文体总集编纂体例。此外,各大类书丰富的文体文献史料汇辑对当下学术界的文体研究也大有益处。对于这些重要的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为传统文体学研究开启一扇重要的窗

口,而竞泽在本书上编中的相关研究,对于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而言,事实上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拓展意义。其次,文体个案研究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唐宋新创文体类目很多,学术研究空间很大。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看出:一、前代产生或定型,但在宋代成熟和兴盛的文体。最典型的是词,已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宋代文学的代表文体。其他如集句、笔记、语录、杂文、宫词等也是如此;二、宋代产生或衍变,但在元明清成熟和达到极盛。这主要以小说、戏剧为主;三、宋代始创和兴盛的文体。如诗话、帖子词、乐语、学记、日记体、题跋、上牌文、口宣、右语、笏记、御札、义(制义、经义)、说书(经筵进讲)、表本等。在该著下编之中,竞泽对于词、小说、戏剧、诗话、笔记等前人研究已经非常充分的文体,基本从略,不再涉及,而对于学术界至今仍较少关注的如帖子词、乐语、学记、语录、杂文、宫词等若干文体,则分别进行了个案研究,并且力求从中总结出宋代文体盛衰的一般性规律。竞泽对于这些文体的个案研究,成为该著内容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学术价值也是可以期待的。

以上简略地谈了谈笔者对竞泽该著的一些肯定性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竞泽的此项研究已经达到了圆熟、完美的程度,事实上,该书还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或曰缺憾:一、《导论》部分过于就事论事,理论穿透力较弱,尤其是应该有一个站在相当的理论高度、问题意识突出、对于宋代文体学思想发展演进及其特点呈现宏观整体上的阐述;二、竞泽在该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视野,应该说是较为开阔的,尤其是将批评史话语与文学史话语融合得很好,但是在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方面,比如从

“国学”视野出发的“大文论”的角度来分析、阐释有关文体现象方面,也还是有所欠缺的,在理论方面尚可以进一步提升;三、下编之文体个案研究,在阐述有关文体现象时,应该对于所研究的这些文体体现出来的文体衍生、文体变异等现象,在理论层面多加阐发,因为这种文体衍生、文体变异现象,在传统文体演变过程中,往往具有风标性质的作用,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语言学转向或功能价值转向的内容。这里特意提出这三点近乎于苛求的意见,实际上体现了我本人对于竞泽今后的学术研究的一种期望。当然,关于本书在文献、史实,以及立论方面的具体评价,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问题的学术评价,应该由更加熟悉宋代文学和文献典籍的专业人士来进行,而我本人则是力所不能从心的。

竞泽性情纯厚,勤奋好学,在治学方面,聪颖但不浮躁,质朴但不酸寒。我想,只要如现在这样一直坚持努力下去,他在学术研究上一定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而这也正是我所期盼于他的。

是为序。

党圣元

辛卯年九月于京北寓所